

## 蘇黃優劣之爭述論

姚 大 勇\*

<目次>

I. 引言	IV. 明清
II. 兩宋	V. 結語
III. 金元	

### I. 引 言

蘇軾(1037~1101)與黃庭堅(1045~1105)皆為北宋詩文大家，二人名並日月，義兼師友，遭際也相似，俱受朝廷黨爭影響，坎壈終身。二人都擅長於詩，為宋代詩壇別開生面，另啟新風，所作詩篇傳佈天下，膾炙人口。蘇、黃並稱，由來已久，但在他們生前身後，對二人卻有不同評價，有時甚至截然相反，蘇黃優劣之爭，綿延近千年，遂成中國古代文學史、詩學批評史上一大公案。本文對歷史上的蘇黃優劣之爭略作縷敘，以尋繹其發展理脈，把握其內裏實質。

### II. 兩 宋

北宋神宗熙寧五年(1072)，蘇軾於湖州(今屬浙江)，在黃庭堅岳父孫覺處首次見到黃庭堅詩文，即“聳然異之，以為非今世之人也。”孫覺請蘇軾為當

\* 高麗大 中文科 副教授。

時尚不太爲人所知的黃庭堅稱譽揚名，蘇軾笑曰：“此人如精金美玉，不即人而人即之，將逃名而不可得，何以我稱揚爲！”五年之後（熙寧十年，1077），蘇軾又于濟南在黃庭堅舅父李常處再次見到黃庭堅更多詩文，對其才學與爲人都更爲瞭解：“意其超逸絕塵，獨立萬物之表，馭風騎氣，以與造物者遊，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，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疏者，亦莫得而友也。”（均見《蘇軾文集》卷五二《答黃魯直五首》第一書<sup>1)</sup>）。從元豐元年(1078)起，蘇、黃二人開始有文字交往，雖未謀面，但傾心仰慕。是年春，蘇軾作《春菜》詩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一六），黃庭堅次韻答之（《山谷外集詩注》卷三《次韻子瞻春菜》），同年黃庭堅寄書信和古詩二首與蘇軾（分見《豫章黃先生文集》卷一九《上蘇子瞻書》第一書和卷二《古風二首上蘇子瞻》），有欲托于門下之意，蘇軾也分作詩文一一答之（分見《蘇軾文集》卷五二《答黃魯直書》之一，《蘇軾詩集》卷一六《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》）。哲宗元祐元年(1086)蘇軾在京爲起居舍人、中書舍人，黃庭堅爲秘書省校書郎，二人始在京城相遇，並一見如故，結爲莫逆。

蘇軾、黃庭堅于元祐初年正式訂交，時二人已都有詩名。元祐時期(1086~1093)堪稱中國文化史上的“盛世”，元祐初以蘇軾、黃庭堅、秦觀、李公麟等爲代表的一批文壇俊彥齊聚京師，蘇、黃二人均爲宋詩的代表人物，宋詩特徵也適於此時形成，據記載，“元祐中，（黃庭堅）爲校書郎。先是，秦少游、晁無咎、張文潛皆以文學游蘇氏之門，至是同入館，世號四學士。魯直之詩尤奇，世又謂之蘇、黃云。”（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卷一九）“始庭堅與秦觀、張耒、晁補之皆游蘇軾之門，號四學士，而庭堅于文章特長於詩，獨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蘇軾，謂之蘇、黃云。”（王偁《東都事略》卷一一六《黃庭堅傳》）元祐時期蘇軾、黃庭堅已開始並稱，宋人言及本朝詩時，也常是蘇、黃連舉，如曰：“山谷老人自卯角能詩……始受知于東坡先生，而名達夷夏，遂有蘇、黃之稱。”（吳炯《五總志》）“學詩須熟看老杜、蘇、黃，亦先見體式，然後徧考他詩，自然工夫度越他人。”（呂本中《童蒙詩訓·文字體式》）

1) 因本文徵引文獻較多，爲避繁瑣，引文採用行間夾註，標明作者、書名、卷數和篇名。

“若唐之李、杜、韓、柳，本朝之歐、王、蘇、黃，清辭麗句，不可悉數，名與日月爭光，不待摘句言之也。”(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·後集》卷二胡仔自語) “學詩當以杜爲體，以蘇、黃爲用，拂拭之則自然波峻，讀之鏗鏘。”(吳可《藏海詩話》) “唐云李、杜，宋言蘇、黃，將四家之外，舉無其人乎?”(楊萬里《江西宗派詩序》，《誠齋集》卷七九) “蘇黃自是今時友，李杜還我異代豪。”(姜特立《看詩卷》，《梅山續稿》卷一六) “蘇、黃只是今人詩”；“作詩先用看李、杜，如土人治本經，本既立，次第方可看蘇、黃，以次諸家詩。”(朱熹《朱子語類》卷一四〇) “元祐初，黃、秦、晁、張各擅毫墨，待價而顯。許之者以爲古人大全，賴數君復見。”(葉適《題陳壽老文集後》，《水心集》卷二九) “我列聖以人文陶天下，學問議論文章之士，莫盛于熙、豐、元、紹間，其生也類在神文朝，如詩家曰蘇、黃，曰黃、陳。”(洪咨夔《豫章外集詩注序》，《平齋文集》卷一〇) “南渡前說詩文家必曰蘇、黃，南渡後說道學家必曰朱、張。”(胡次焱《跋輜軒唱和詩集》，《梅巖文集》卷七) 蘇、黃並稱已成爲元祐之後宋人的共識，二人也是互相仰慕尊重，如元祐二年(1087)，蘇軾作《送楊孟容》詩，自謂“效山谷體”(見《蘇軾詩集》卷二八，另見《王直方詩話·東坡效山谷體》)，黃庭堅和詩題目也是《子瞻詩句妙一世，乃云“效庭堅體”，蓋退之戲效孟郊、樊宗師之比，以文滑稽耳，恐後生不解，故次韻道之》(《豫章黃先生文集》卷二) 二人天性豪蕩，不爲禮法所拘，相互之間偶有戲謔，對對方詩文的優點與不足也有獨到的認識，並不諱言，且常以形象詼諧之語言之。黃庭堅在《答洪駒父第二書》(《豫章黃先生文集》卷一九)中就諄諄告誡後輩曰：“東坡文章妙天下，其短處在好罵，慎勿襲其軌也。”蘇軾也說：“讀魯直詩，如見魯仲連、李太白，不敢復論鄙事，雖若不入用，亦不無補於世也。”“魯直詩文如螭蟠江瑤柱，格韻高絕，盤飧盡廢；然不可多食，多食則發風動氣”(《蘇軾文集》卷六七《書黃魯直詩後二首》)蘇、黃在當時也都以書藝擅長，齊名書壇，二人也嘗相與論書：“東坡嘗與山谷論書，東坡曰：‘魯直近字雖清勁，而筆勢有時太瘦，幾如樹梢掛蛇。’山谷曰：‘公之字固不敢輕議，然間覺褊淺，亦甚似石壓蝦蟆。’二公大笑，以爲深中其病。”(曾敏行《獨醒雜誌》卷三)對於學書之法，黃庭堅曰：

“草書祇要有筆，霍去病所謂不至學古兵法者為過之。”蘇軾則曰：“去病穿穴蹋鞠，此正不學古兵法之過也。學即不是，不學亦不可。”（《蘇軾文集》卷六九《跋黃魯直草書》）從蘇、黃對“法”的不同認識，適顯出二人詩道之有異。

因有這些言語，故也引起世人對二人之間關係的猜測和非議，“元祐文章，世稱蘇黃。然二公當時爭名，互相譏訕，東坡嘗云：‘黃魯直詩文，如蝨蟬江珧柱，格韻高絕，盤飧盡廢，然不可多食，多食則發風動氣。’山谷亦云：‘蓋有文章妙一世，而詩句不逮古人者。’此指東坡而言也。二公文章，自今視之，世自有公論，豈至各如前言？蓋一時爭名之詞耳。俗人便以為誠然，遂為譏議，所謂‘蚍蜉撼大樹，可笑不自量’者邪？”（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前集卷四九胡仔自語）將二人的相關言論，視為“一時爭名之詞”，甚至將東坡論山谷詩之句，徑指為譏刺之語：“魯直謂東坡作詩未知句法，而東坡題魯直詩云：‘每見魯直詩，未嘗不絕倒。然此卷甚妙，而殆非悠悠者可識。能絕倒者，已是可人。’又云：‘讀魯直詩，如見魯仲連、李太白，不敢復論鄙事，雖若不適用，然不為無補。’如此題識，其許之乎？其譏之也。”（葛立方《韻語陽秋》卷二）即如黃庭堅追和蘇軾的詩《子瞻詩句妙一世……》，其首云：“我詩如曹鄴，淺陋不成邦。公如大國楚，吞五湖三江。”宋人也為之強作解會：“黃魯直次東坡韻云：‘我詩如曹鄴，淺陋不成邦。公如大國楚，吞五湖三江。’其尊坡公可謂至，而自況可謂小矣。而實不然，其深意乃自負而諷坡詩之不入律也。曹鄴雖小，尚有四篇之詩入國風；楚雖大國，而《三百篇》絕無取焉。至屈原而始以騷稱，為變風矣。黃又嘗謂坡公文好罵，謹不可學，又指坡公文章妙一世，而詩句不迨古人，信斯證也。”（史繩祖《學齋佔畢》卷二）這種解詩方法，可謂用心良苦，但與事實恰是南轅北轍。對黃庭堅此詩句清人倒是有較為通達的看法：“予謂此說魯直不甚服坡詩，可也；謂其曹、鄴、楚之喻，暗含譏刺，殊失朋友忠直之道，似與魯直為人不類。蓋曹、鄴、楚云云，自就詩之氣象言耳，謂以此自負而刺坡，則楚騷亦不易到，而魯直平時之詩，豈真能與國風抗衡而敢以之自負哉？以晚近文人相輕之心測度古賢，予不以為然。”（潘德輿《養一齋詩話》卷一）指出用這種穿鑿牽強的方法去解黃詩，是後人以文人相輕之心去揣度古人，可說探到了導致

這一誤解的病根。

蘇、黃二人原是豁達幽默之人，都性喜談諧，在主持禮部試時即曾“試筆滑稽”(見楊萬里《跋蘇黃滑稽錄》，《誠齋集》卷九九)雖有時互相戲謔，然正是親密無間的表現。二人內心實相互推尊，對文學藝術即使有不同見解，也並不妨礙二人的交往與友情。蘇軾曾舉黃庭堅以代自己：“蒙恩除臣翰林學士，伏見某官黃某，孝友之行追配古人，瑰璋之文妙絕當世，舉以自代，實充公議。”(《蘇軾文集》卷二四《舉黃魯直自代狀》)於黃庭堅的品行與才學，真心佩服，對黃庭堅之詩，也持肯定、讚賞的態度，“歐陽季默嘗問東坡：‘魯直詩何處是好?’東坡不答，但極口稱重黃詩。季默云：‘如“臥聽疏疏還密密，曉看整整復斜斜”，豈是佳耶?’東坡云：‘此正是佳處。’”(呂本中《紫微詩話》。此事另見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卷一一)海納百川，有容乃大，對批評意見的寬容與接受，也正是自身大度自信的表現。與黃庭堅同為蘇門學士的張耒即記：“蘇長公有詩云：‘身行萬里半天下，僧臥一庵初白頭。’黃九云‘初日頭’，問其義，但云若此僧負暄于初日耳。余不然，黃甚不平，曰：‘豈有用“白”對“天”乎?’余異日問蘇公，公曰：‘若是黃九改作“日頭”，也不奈何。’”人們常謂蘇文如海，東坡胸懷寬大，也浩瀚如海。對蘇、黃二人的交誼，宋人也有中肯的看法：“蘇、黃二公同時，實相引重，黃推蘇尤謹，而蘇亦獎成之甚力。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，乃云效庭堅體，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詩。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、李太白，不敢復論鄙事。其互相推許如此，豈爭名者哉!詩文比之螭蚌江珧柱，豈不謂佳，至言發風動氣，不可多食者，謂其言有味，或不免譏評時病，使人動不平之氣。乃所以深美之，非譏之也。文章妙一世，而詩句不逮古人，此語蓋指曾子固，亦當時公論如此，豈坡公邪?以坡公詩句不逮古人，則是陳壽謂孔明兵謀將略非其所長者也。”(王楙《野客叢書》卷七《蘇黃互相引重》引郭次象語)黃庭堅云東坡文章妙一世，蘇軾謂讀山谷詩如見魯仲連、李太白，這是二人互相推重之語，而非爭名之詞。蘇、黃之間情誼深厚，關係融洽，于對方的藝術成就真心欣賞，赤誠相見，堪稱宋代的俞伯牙與鐘子期。蘇、黃皆為詩壇大家，久負盛名，然在當時和後世，對二人也有不同評價。

宋人在論及蘇、黃之詩時，常將二人並舉，並指明各自的特點，如云：“蘇子瞻以新，黃魯直以奇”(陳師道《後山詩話》)；“東坡豪，山谷奇”(吳可《藏海詩話》)；“東坡長於古韻，豪逸大度；魯直長於律詩，老健超邁”(釋普聞《詩論》)；“蘇才豪，然一滾說盡無餘意。黃費安排”(朱熹《朱子語類》卷一四〇)；“坡詩天才高妙，谷詩學力精嚴；坡律寬而活，谷律刻而切”(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卷二一《春雪呈張仲謀》詩下評)。正是在對比中，二人詩作的特點才更為鮮明。宋人也喜以形象之語論二人詩風之異，如：“黃太史詩，妙脫蹊徑，言謀鬼神，唯胸中無一點塵，故能吐出世間語；所恨務高，一似參曹洞下禪，尚墮在玄妙窟裏。東坡詩，天才宏放，宜與日月爭光，凡古人所不到處，發明殆盡，萬斛泉源，未為過也；然頗恨方朔極諫，時難以滑稽，故罕逢醞藉。”(蔡條《百衲詩評》，見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後集》卷三三引)“蘇、黃之別，猶丈夫女子之應接，丈夫見賓客，信步出將去，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。”(林光朝《艾軒集》卷五《讀韓柳蘇黃集》)“蘇東坡如屈注天潢，倒連滄海，變眩百怪，終歸雄渾。……山谷如陶弘景祇詔入宮，析理談玄，而松風之夢故在。”(敖陶孫《臞翁詩評》，魏慶之《詩人玉屑》卷二引)另外呂本中還通過讀《莊子》和《左傳》的不同感受，來說明東坡、山谷詩的特色：“讀《莊子》令人意思寬大敢作。讀《左傳》便使人入法度，不敢容易。此二書不可偏廢也。近世讀東坡、魯直詩，亦類此。”(《童蒙詩訓·蘇黃詩不可偏廢》)通過這些形象的說法(主要是比喻)，二人詩作的特徵讓人宛然在目。諸人論蘇黃二人之不同，未明言褒貶優劣，但從中均可見他們揭示出了蘇詩追天然而顯流暢，黃詩重雕琢而呈奇崛的特徵。蘇、黃之詩成了宋詩的兩種範式，元祐以後的宋代詩壇基本上不出蘇、黃兩家的苑囿，“師坡者萃於浙右，師谷者萃於江右。以余觀之，大是雲門盛于吳，林濟盛于楚。……噫！坡、谷之道一也，特立法與嗣法者不同耳。”(吳炯《五總志》)“元祐以後，詩人迭起，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，一種則鍛煉精而情性遠，要之不出蘇、黃二體而已。”(劉克莊《後村詩話·前集》卷二)從蘇黃對詩壇的不同影響，也可反窺二人詩作的差異。

宋人對蘇黃一般均較推崇，對於二人詩的不足之處，宋人也多有指出。

北宋時魏泰就言“黃庭堅喜作詩得名，好用南朝人語，專求古人未使之事，又一二奇字，綴葺而成詩，自以爲工，其實所見之僻也。故句雖新奇，而氣乏渾厚。”(《臨漢隱居詩話》)指出黃庭堅詩好用奇字僻典，因過於追新逐奇而有傷於詩的渾厚之氣。南北宋之交的葉夢得也謂“余數見交遊，道魯直語意殊不可解”(《石林詩話》卷中)爲何語意難解？多用奇字僻典故也。爲江西詩社作宗派圖的呂本中，既將蘇、黃與老杜比肩，提出“東坡句法”、“魯直句法”，與“老杜句法”並稱，認爲“學者若能徧考前作，自然度越流輩。”(見《童蒙詩訓·前人文章句法》)“學詩須熟看老杜、蘇、黃，亦先見體式，然後徧考他詩，自然工夫度越他人。”(《童蒙詩訓·文字體式》)同時也不諱言蘇、黃詩的短處：“東坡詩有汗漫處；魯直詩有太尖新、太巧處”(《童蒙詩訓·學古人文字須得其短處》)。指出蘇詩重天然而有疏于章法，黃詩重人工而有過於生新之處，可謂識見精深，洵非空言。同時的張戒也揭江西詩弊：“黃魯直自言學杜子美，子瞻自言學陶淵明，二人好惡，已自不同。魯直學子美，但得其格律耳。”“近世蘇、黃亦喜用俗語，然時用之，亦頗安排勉強，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。”“詩以用事爲博，始于顏光祿，而極于杜子美；以押韻爲工，始于韓退之，而極于蘇黃。……蘇、黃用事押韻之工，至矣盡矣，然究其實，乃詩人中一害。”“《國風》、《離騷》固不論，自漢魏以來，詩妙於子建，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。……子瞻以議論作詩，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，學者未得其所長，而先得其所短，詩人之意掃地矣。”(均見《歲寒堂詩話》卷上)張戒不爲時流所左右，在舉世爭學江西時，就敏銳地認識到此派詩的弊端，他所指摘的，主要是蘇、黃二人以文爲詩，在詩中使用生字俗語僻典，使詩歌失去了吟詠情性的旨趣。他所言雖語有所過激，但對蘇黃詩弊病(主要是使事用典方面)的揭露卻是切中肯綮。經過不斷深化認識，到南宋中後期，嚴羽對蘇、黃二家詩的看法更爲透徹。他在論宋詩特點時，自然論及蘇黃，提出以蘇軾、黃庭堅和陳師道爲代表的“元祐體”和以山谷爲宗的“江西宗派體”，以與建安體、盛唐體和元和體等並列(見《滄浪詩話·詩體》)，同時還認爲：“詩者，吟詠情性也。盛唐諸人惟在興趣，羚羊掛角，無跡可求，故其妙處透徹玲瓏，不可湊泊。……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……至東坡、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爲詩，唐人之

風變矣。”(《滄浪詩話·詩辨》)“坡、谷諸公之詩，如米元章之字，雖筆力勁健，終有子路未事夫子時氣象。盛唐諸公之詩，如顏魯公書，既筆力雄壯，又氣象深厚，其不同如此。”(《滄浪詩話附錄·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》)嚴羽不滿宋詩的“以文字爲詩，以才學不詩，以議論爲詩”(《滄浪詩話·詩辨》)，對宋詩特點與弊端的揭露不可謂不深刻，概括不可謂不精當，蘇、黃二人作爲宋詩的代表，也宜乎爲嚴羽所不滿。但是也應看到，蘇、黃二人作爲宋詩風格的主要體現者，在對二人指摘的背後，是以唐詩(主要是盛唐詩歌)爲標準對宋詩的批判，蘇、黃優劣之論，實又涉及到唐宋詩之爭。

黃庭堅名列蘇門學士之首，其聲名也與蘇軾相埒，蘇門文士詩風各異，並不強求一律，自蘇、黃並稱時起，對二人即隱然已有軒輊之分，與二人皆有交往的晁說之稱：“元祐末有蘇黃之稱，漸不平之，或曰：‘蘇公自有芍藥之評，恐未必然也。’”(《嵩山文集》卷一八《題魯直嘗新柑帖》)黃庭堅身後是聲勢浩大的江西詩派，這點爲蘇軾所不及，江西詩派中人在對二人做評價時，往往不免門戶之見。江西詩派本就以黃庭堅爲宗，學江西者推尊黃庭堅，這是毋庸置疑的，如黃庭堅甥洪朋即言：“詩家今獨步，舅氏大名稀。屈宋堪奴僕，曹劉在指揮。”(《洪龜父集》卷下《懷黃太史》)，儼然以黃庭堅之詩爲千古獨步，凌駕于屈(原)、宋(玉)、曹(操)、劉(楨)這些已有定論的詩人之上，蘇軾當然也不在話下。李彭也云：“扈聖當元祐，雄名獨擅場。”(《日涉園集》卷七《上黃太史魯直詩》)將黃推爲元祐詩壇之冠。除了江西派中人以外，其他人也不乏揚黃抑蘇者，如錢文子言：“山谷之詩與蘇同律，而語尤雅健，所援引者乃多於蘇。”(《山谷外集詩注序》，見史容《山谷外集詩注》卷首)陳善謂“魯直嘗言東坡文字妙一世，其短處在好罵爾。予觀山谷渾厚，坡似不及。”(《捫虱新語·上集》卷一《東坡文字好嫚罵》)另外，劉克莊云在歐陽修、蘇軾之後，“豫章稍後出，會萃百家句律之長，究極歷代體制之變，蒐獵奇書，穿穴異聞，作爲古律，自成一家，雖隻字半句不輕出，遂爲本朝詩家宗祖，在禪學中比得達磨，不易之論也。”(劉克莊《江西詩派小序·山谷》)雖未明言蘇、黃高下，但將山谷尊爲“本朝詩家宗祖”，比之爲禪宗初祖，可見是以黃爲宋詩之首。謝枋得也稱欲選古今各家著名詩人之詩爲學詩

之階，其中“次選黃山谷、陳後山兩家詩各編類成一集，此二家乃本朝詩祖；次選韓文公、蘇東坡二家詩共編類成一集。”(《疊山集》卷五《與劉秀岩論詩》)以黃、陳二家為“本朝詩祖”，將韓、蘇列在黃、陳之後，對蘇、黃的高下之評不言自明。這些言語，均主要從詩歌的格律、用典上著眼，評陟蘇、黃之詩，認為黃勝於蘇。也有論者認為蘇、黃二人在文與詩上，各擅勝場，黃詩高於蘇詩，蘇文也勝過黃文：“作文必要悟入處，悟入必自工夫中來，非僥倖可得也。如老蘇之于文，魯直之于詩，蓋盡此理也。”(《童蒙詩訓·作文必要悟》)“自古以來語文章之妙，廣備衆體，出奇無窮者，唯東坡一人；極風雅之變，盡比興之體，包括衆作，本以新意者，唯豫章一人。此二者當永以為法。”(《童蒙詩訓·蘇黃文字之妙》)“子瞻文章去黃遠甚，黃之詩律，蘇亦不逮也。”(陳長方《步裏客談》卷下)“兩蘇而下秦晁張，閉門覓句陳履常。當時姓名比明月，文莫如蘇詩則黃。”(林希逸《竹溪十一稿·讀黃詩》)明言在文，主要是在古文方面，黃不如蘇，在詩，特別是在律詩方面，則以黃為尊。這些見解實都包含著一個基本事實，那就是作為本朝詩(宋詩)的代表，黃詩比蘇詩更具有典型性。宋人論蘇、黃詩時，也有以蘇為優者。南北宋之際的朱弁即云：“東坡文章，至黃州以後，人莫能及。唯黃魯直詩，時可以抗衡。晚年過海，則雖魯直，亦瞠若乎其後矣。或謂東坡過海雖為不幸，乃魯直之大幸也。”(《風月堂詩話》卷上)認為黃庭堅之詩固然超出常人，然也僅可達蘇軾謫黃州之後詩的境界，而東坡晚年被遠貶海南，其詩卻達到了最高境界，非黃庭堅所可企及，儼然是認為在詩歌創作上蘇勝過黃。王十朋也不滿江西詩派中人貶斥蘇詩，他在《讀東坡詩》(《梅溪王先生文集·後集》卷一四)序中說：“學江西詩者，謂蘇不如黃。又言韓、歐二公詩乃押韻文耳。予雖不曉詩，不敢以其說為然。”另在此詩中言道：“東坡文章冠天下，日月爭光薄風雅。誰分宗派故謗傷，蚍蜉撼樹不自量。……二百年來無此作，誰與爭先惟大蘇。謫仙退之非過呼，胸中萬卷古今有，筆下一點塵埃無。武庫森然富摛揆，利鈍一從人點檢。暮年海上詩更高，和陶之詩又過陶。地辟天開含萬匯，少陵相逢亦應避。”他不然江西詩派之說，也不滿此派的門戶之見，指出了蘇詩的特色和地位，對蘇不如黃之說進行了反駁，雖未明言孰高孰低，但

從詩的末句，可見他還是以蘇為高。在另一首詩中，王十朋也言黃庭堅是“豫章官逸遠，直筆非謗史。天遣來黔涪，詩鳴配子美”(《梅溪王先生文集·後集》卷一四《夔路十賢續訪得七人——黃太史》)認為山谷可追配少陵，但是《讀東坡詩》中謂少陵見了東坡亦應退避三舍，兩相對照，可見他仍是以東坡為高。朱熹對蘇、黃、陳也做過比較：“後山、山谷好說文章，臨作文時，又氣餒了。老蘇不曾說，到下筆時，做得卻雄健。”(《朱子語類》卷一三九)認為黃陳臨文氣餒，東坡落筆雄健，若論詩藝，黃終遜蘇一層。蘇黃二人義兼師友，後人品評二人時卻常生門戶之見，“近世詩家知尊杜矣，至學蘇者乃指黃為強，而附黃者亦謂蘇為肆”(陳與義語，《簡齋詩外集》卷首晦齋《簡齋詩集引》)相互攻訐之語，有時難免有過激之處。然從宋人對蘇黃二人詩作的諸多評議，不難見出蘇詩重自然，而黃詩講法度，蘇詩追天工，而黃詩推人力，見出二人詩作的基本特徵。蘇黃“優劣”之爭，于宋時已分門庭，在後世更是流派紛呈，波瀾迭起。

### III. 金 元

蘇軾、黃庭堅文章學術不僅盛行於南方，也傳播到北地，“百年以來，詩人多學坡、谷”(元好問《遺山先生文集》卷四〇《趙閑閑擬和韋蘇州詩跋》)，“宋南渡後，北宋人著述有流播在金源者，蘇東坡、黃山谷最盛。”(趙翼《甌北詩話》卷十二)蘇軾詩文在北宋時就已遠傳於遼，到金代更得到廣泛尊崇，一直享有盛名，與之相反，山谷在金源的聲譽則要遜於東坡。

蘇、黃遺墨流傳于世，向為人所珍賞。趙秉文即對黃庭堅書法頗為推重：“涪翁參黃龍禪，有倒用如來印手段，故其書得筆外意……涪翁自謂中年以草書名世，惟東坡以為俗。此其暮年書也，知東坡之所謂俗，則知涪翁之不俗矣，技進乎此矣。”(《閑閑老人滌水文集》卷四《題涪翁草書〈文選〉書後》)蘇、黃二人在書壇亦並稱，趙秉文認為黃庭堅晚年書法得筆外意，技進乎道，可見對其評價之高。由此對涪翁書法的肯定，也可見對黃的推尊。當

時人也確有由黃庭堅書法，進而推尊其詩，如周昂曰：“詩健如提十萬兵，東坡真欲避時名。須知筆墨渾閒事，猶與先生抵死爭。”（《中州集》卷四《魯直墨帖》）認為山谷不僅書法可與東坡一爭高下，詩歌也讓東坡退避三舍。金源立國之初，也有對蘇黃皆不滿意者，趙秉文嘗記人言曰：“少初識尹無忌，問：‘久聞先生作詩不喜蘇、黃，何如？’無忌曰：‘學蘇、黃則卑猥也。’”（見劉祁《歸潛志》卷八）尹無忌不喜蘇、黃之詩，認為學二人之詩易使詩格調低下，這隱然已開明代前後七子“詩必盛唐”的先聲。

宋金對峙時，黃庭堅詩在南方得到普遍推尊，在北地，雖也有師法江西，踐履黃、陳之跡者，然其影響終不及東坡。王若虛記其舅父周德卿自幼時為詩，便祖杜甫而摒山谷：“吾舅兒時，便學工部，而終身不喜山谷也。若虛嘗乘間問之，則曰：‘魯直雄豪奇險，善為新樣，固有過人者。然於少陵初無關涉，前輩以為得法者，皆未能深見耳。’”（《滄南詩話》卷一）王若虛可謂金源揚蘇抑黃的代表，他不滿江西派中人認為黃勝於蘇，而對蘇軾讚不絕口：“世稱李、杜，而李不如杜；稱韓、柳，而柳不如韓；稱蘇、黃，而黃不如蘇，不必辨而後知。歐陽公以為李勝杜，晏元獻以為柳勝韓，江西諸子以為黃勝蘇，人之好惡固有不同者，而古今之通論不可易也。”（《滄南遺老集》卷三五《文辨》）他對黃庭堅實無好語：“東坡，文中龍也，理妙萬物，氣吞九州，縱橫奔放，若遊戲然，莫可測其端倪。魯直區區持斤斧準繩之說，隨其後而與之爭，至謂未知句法，東坡而未知句法，世豈復有詩人？而渠所謂法者，果安出哉？老蘇論揚雄，以為使有孟軻之書，必不作《太玄》。魯直欲為東坡之邁往而不能，於是高談句律，旁出樣度，務以自立而相抗，然不免居其下也，彼其勞亦甚哉，向使無坡壓之，其措意未必至是。世以坡之過海為魯直不幸，由明者觀之，其不幸也舊矣。”“山谷之詩，有奇而無妙，有斬絕而無橫放，鋪張學問以為富，點化陳腐以為新，而渾然天成，如肺肝中流出者，不足也。此所以力追東坡而不及歟？或謂論文者尊東坡，言詩者右山谷，此門生親黨之偏說，而至今詞人多以為口實，同者襲其跡而不知返，異者畏其名而不敢非。”（《滄南詩話》卷二）認為東坡詩文要明顯地超過山谷，俗言有謂東坡不知句法，王若虛則針鋒相對地指出，若謂東坡不知句法，那

麼世上就沒有詩人了。其對山谷詩病的抉摘是頗為犀利的，主要就是指出其因為過於人工，過於求奇，而損壞了詩的渾然天成的風致。另對於“論文者尊東坡，言詩者右山谷”，也指出這是“門生親黨之偏說”，不足為據。“山谷自謂得法於少陵，而不許於東坡。以予觀之，少陵，《典謨》也，東坡，《孟子》之流，山谷則揚雄《法言》而已。”（《淳南詩話》卷三）以杜甫為儒家經典，東坡為孟子之流，山谷為揚雄《法言》，則山谷明在東坡之下。黃庭堅所倡的“奪胎換骨、點鐵成金”之喻，在王若虛眼中，也成了欺蒙世俗之言：“魯直論詩，有奪胎換骨、點鐵成金之喻，世以為名言，以予觀之，特剽竊之點者耳。魯直好勝，而恥其出於前人，故為此強詞，而私立名字。夫既已出於前人，縱復加工，要不足貴。”（《淳南詩話》卷三）指出山谷所提的“奪胎換骨、點鐵成金”，為“剽竊之點者”，系強為爭勝，掩飾自己鈍拙之舉。他在《評東坡山谷四絕》（《淳南遺老集》卷四五）詩序中言：“山谷於詩每與東坡相抗，門人親黨遂謂過之，而今之作者亦多以為然”，在第四首詩中云：“文章自得方為貴，衣鉢相傳豈是真？已覺祖師低一著，紛紛法嗣復何人。”認為黃詩過於刻削雕琢，講求人力，終不及蘇詩之自然天成。所謂的黃勝於蘇之說，是出於門人親黨的私言。王若虛對黃庭堅詩的批評，可說是“古今來詆訶山谷最嚴厲者”（錢鍾書《談藝錄·金詩與江西派》），他似是有鑒於當時南方江西詩派過於尊黃而有意矯之。

“蘇學盛于北，景行遺山仰。”（翁方綱《復初齋詩集》卷六二《齋中與友論詩五首》之三）王若虛對蘇詩的推尊，為金末元好問（號遺山）所繼承，元好問曾編選《東坡詩雅》三卷以標舉蘇詩，並在此詩選序中言：“近世蘇子瞻絕愛陶、柳二家，極其詩之所至，誠亦陶、柳之亞。……夫詩至於子瞻，而且不能近古之恨，後人無所望矣。”（《遺山先生文集》卷三六《東坡詩雅引》）他並認為“子美夔州以後，樂天香山以後，東坡海南以後，皆不煩繩削而自合，非技進於道者，能之乎？”（《遺山先生文集》卷三七《陶然集序》）以蘇與陶、柳、李、白並列，為“技進乎道”的極致。元好問雖不滿江西末流習氣，在《自題中州集後》（《遺山先生文集》卷一三）中言“北人不拾江西唾”，但把江西詩派的宗主黃庭堅與其後學分開，在《論詩絕句三十首》（《遺

山先生文集》卷一一)中說：“論詩寧下涪翁拜，未作江西社裏人。”(之二十九)在推重蘇詩的同時，也不廢黃詩：“只知詩到蘇、黃盡，滄海橫流卻是誰？”(之二十四)將蘇、黃並舉。推蘇而不抑黃，將黃與其江西詩派其他人分開，這是元好問不同于金源其他人之處，也見他對蘇黃優劣之爭的持平之論。

江西詩派自形成後綿延直至宋末，入元後仍不絕如縷，黃庭堅在南宋詩壇一向不乏推尊，這也直接影響了元代的詩壇風會。宋末元初，方回重振江西詩派，並倡“一祖三宗”之說，以黃庭堅為此派的一宗，上繼老杜，下開新風，“大概律詩當專師老杜、黃、陳、簡齋，稍寬則梅聖俞，又寬則張文潛，此皆詩之正派也。”(《桐江集》卷一《送俞唯道序》)“學老杜詩，當學山谷詩，又當知山谷所以處遷謫而浩然於去來者，非但學詩而已。”(《瀛奎律髓》卷四三黃庭堅《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》詩下評語)方回是以江西詩派之詩為詩家正宗，並擴大了此派的範圍，以山谷為上攀少陵的必經之途，欲學杜詩，從黃詩入手為一捷徑。對黃之人格，也予以褒揚，認為山谷屢經遷謫，備嘗坎坷而壯志不衰，風節不改，這是因胸中有浩然之氣，精神修養境界高深，故能于人世的風雲變幻，了不掛懷於心，這又不是僅僅學詩所能達到的。方回於山谷，不僅推重其詩，更推重其人。方回在推尊以黃庭堅為代表的江西派詩之時，也不貶抑蘇詩，而是看到了二人之詩的各自擅長之處：“蘇、黃名出同時……坡詩天才高妙，谷詩學力精嚴；坡律寬而活，谷律刻而切云。”(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卷二一《春雪呈張仲謀》詩下評)對二人詩歌不同之點的概括可謂精當，反映了他對蘇、黃之詩的深刻把握，至此黃詩又逐漸恢復了與蘇詩並尊的地位。

與金人不同，元人對山谷詩多有好語。如劉燾即謂山谷的《書摩崖碑後》、《題老杜浣花醉圖》二詩“皆精深有議論，嚴整有格律”，並列舉黃詩中的佳聯，稱：“山谷所長在古體，固不以律名，然時作律詩，亦自有一種句法。”(《隱居通議》卷八《山谷諸作》)對山谷詩律，也評價極高：“山谷詩律精深，是其所長，故凡近於詩者無不工，如古賦與夫贊銘有韻者率入妙；他如序記散文，則殊不及也。”(《隱居通議》卷十八《詩文工拙》)認為山谷最長在詩，與詩有關的賦和其他有韻之文亦工，無韻之散文則不及。作家不可

能是文藝全才，樣樣皆擅，這評判可以說符合黃庭堅的創作實際。同時他又將蘇黃並提：“少陵詩似《史記》，太白詩似《莊子》，不似而實似也；東坡詩似太白，黃、陳詩似少陵，似而又不似也。”（《隱居通議》卷六《李杜蘇黃》）他不同於前人，提出了蘇軾、黃庭堅、陳師道和李白、杜甫詩之間似又不似的關係，頗為新穎，對蘇、黃二人，並無軒輊之意。元人袁桷也推尊黃庭堅，他在《書黃彥章詩編後》言“元祐之學鳴紹興，豫章太史詩行於天下。”（《清容居士集》卷四八）謂南宋初期隨著元祐黨人政治上獲得平反，學術上也重新為人所重，以黃為代表的江西詩派之詩亦風行天下。另他在《劉敏叔畫八君子圖贊——黃太史》中贊黃庭堅是：“泐泐脩水，誕弘文明。維太史氏，穎敏之功，由彼岐嶷，揚譽上京，服襲瑰璋，綜覈文藝，剖析幽翳。”（《清容居士集》卷一七）對黃之人品文藝，推崇備至。

元人對蘇、黃，一般也是並尊，如徐明善云：“中州士大夫文章翰墨頗宗蘇、黃，蓋唐有李、杜，宋有二公，適筆快句，雄文高節，今古罕儔，宗之宜矣。”（《芳谷集》卷一《送黃景章序》）將宋之蘇、黃與唐之李、杜並舉，俱推為師法的對象。孫作也云：“蘇子落筆奔海江，豫章吐句敵山嶽。湯湯濤瀾絕崖岸，嶢嶢木石森劍槩。”（《滄螺集》卷一《還陳檢校山谷詩》）以形象之語說明了蘇、黃詩的不同特徵，也體現出他對二人的一體推尊。元修《宋史》時，也承襲了王偁《東都事略》之說，以蘇黃並稱（見《宋史》卷四四四《黃庭堅傳》）。元人對蘇黃優劣之爭的態度也較通達，李治即謂：“人言山谷之於東坡，常欲抗衡而常不及，故其詩文字畫，別為一家，意若曰：‘我為汝所為，要好人在後，我不為汝所為，則必得以名世，成不朽。’此其為論也隘矣。凡人才之所得千萬，而蔑有同之者，是造物者之大恒也。”同時認為金人周昂所言蘇黃詩、書相敵之論是“亦以世俗之口量前人之心也”（《敬齋古今鞋》卷八）認為世俗所言山谷為了和東坡相抗衡而故意與蘇立異，別辟蹊徑之說，恰恰是狹隘的門戶之見，是對山谷的誤解，並著重指出各人風格不同，是自然形成，非強力所致，這洵是對蘇、黃二人詩壇齊名而風格有異的頗為合理的解釋。元人對蘇、黃詩的特點也有認識：“黃太史必于奇，蘇學士必于新，荊國丞相必于工，此宋詩之所以不能及唐也。”（吳澄《王實翁詩

序》，《臨川吳文正公集》卷一〇）此實為接續北宋後山之說，指明王安石、蘇軾、黃庭堅三家詩之異同，且引入唐宋詩優劣之辯，認為宋詩不如唐詩，所持尺度仍為唐詩。經過在金源的浮沉，到元代黃詩又重新與蘇詩並駕齊驅。

#### IV. 明 清

明代盛行唐風，宋詩遭到冷落，對蘇、黃二人的評價總體來說並不高。明前期茶陵派領袖李東陽尚受前人影響，對揚黃抑蘇的觀點不滿：“昔人論詩，謂韓不如柳，蘇不如黃。雖黃亦云：‘世有文章名一世，而詩不逮古人者。’殆蘇之謂也。是大不然。漢魏以前，詩格簡古……賴杜一出，乃稍為開擴，庶幾可盡天下之情事，韓一衍之，蘇再衍之，於是情與事無不可盡。”（《懷麓堂詩話》）“子瞻豪雄浩翰，決不出山谷下”（《懷麓堂全集·文稿》卷二一《書愧齋唱和詩序後》），指明了蘇詩在詩史上的地位，對世人所謂的黃勝於蘇的觀點不以為然，在對蘇詩肯定的同時，流露出的是對黃詩的不滿。自明中葉起，前後七子先後崛起文壇，倡言“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”，標舉唐詩，鄙薄宋詩，憎屋及烏，對蘇、黃也少有好語。後七子領袖王世貞主盟文壇數十年，明言黃不如蘇：“詩格變自蘇、黃，固也，黃意不滿蘇，直欲凌其上，然故不如蘇也。何者？愈巧愈拙，愈新愈陳，愈近愈遠。”（《藝苑卮言》卷四）認為黃雖有與蘇爭勝的雄心，但因過於求巧求新，反而有傷詩的自然之旨，黃也因此反而離蘇愈遠。黃詩不入其法眼，“魯直不足小乘，直是外道耳”（《藝苑卮言》卷四），同時他對蘇軾評價也不是太高：“讀子瞻文，見才矣，然似不讀書者；讀子瞻詩，見學矣，然似絕無才者。”（《藝苑卮言》卷四）王世貞的這番言語，反映了當時人對蘇黃的普遍觀點。受崇尚唐音的詩壇風會影響，胡應麟對蘇、黃二人之詩也皆不滿：“禪家戒事、理二障，余戲謂宋人詩病政坐此。蘇、黃好用事而為事使，事障也。程、邵好談理而為理縛，理障也。”（《詩藪·內編》卷二）“蘇、黃矯晚唐而為杜，得其變而不得其正，故

生澀峻嶒而乖大雅。”“蘇、黃初亦學唐，但失之耳。”（《詩藪·外編》卷五）認為蘇、黃好使事用典，反為事使，恰陷入“事障”，學習唐詩也不得其正，而有失大雅，誤入歧途，因此對二人評價均不甚高，甚至認為蘇黃是敗壞宋詩的禍魁：“永叔、介父，始欲汎掃前流，自開堂奧，至坡老、涪翁，乃大壞不可復理。”（《詩藪》外編卷五）對蘇黃的一體並黜，其背後的思想基礎是盛行於明代的揚唐抑宋之風。

後七子時期，就已有有人對他們崇尚漢唐，一味復古的主張不滿，要重新審視宋元之詩。唐順之就謂：“黃豫章詩，真有憑虛欲仙之意，此人似一生未嘗食煙火食者，唐人蓋絕未見有到此者也。雖韋蘇州之高潔，亦須讓出一頭地耳。”（《荊川先生文集》卷一七《書黃山谷詩後》）對黃詩的褒揚，隱含著對宋詩的推重，但這番言語，在當時仿佛是空谷足音，實難獲得普遍的認同與回應。明後期登上文壇的公安派，也不滿前後七子的主張，重新標舉宋詩，如袁宏道謂：“詩之道，至晚唐而益小，有宋歐、蘇輩出，大變晚習，於物無所不收，於法無所不有，於情無所不暢，於境無所不取，滔滔莽莽，有若江河。”（《袁宏道集》卷一八《雪濤閣集序》）闡明了宋詩在取材、作法上的特點，突出了歐陽修、蘇軾在改變晚唐習氣，建立宋詩風格上的貢獻。許學夷也繼此而言曰：“宋人首稱蘇黃，黃諸體恣意怪僻，遂為變中之變。……然黃竟為江西詩派之祖，流毒終於宋世，中郎直欲舉歐、蘇而置黃勿論，可為宋代功臣”（《詩源辯體·後集纂要》卷一）。許學夷欣賞袁宏道標舉歐、蘇詩，但仍將黃與歐、蘇二人分開，置而勿論，對黃庭堅之詩仍予以貶抑。他也不滿於蘇、黃並稱，認為黃詩刻意求險求怪，並開宗立派，影響了宋詩的健康發展，甚至可說是宋詩的罪人。許學夷對黃貶抑過甚，明顯是過激之詞，於此也可見在當時標舉宋詩之難。有明一代，受崇尚唐音、輕視宋詩這整體詩壇思潮影響，明人對蘇軾尚且褒貶不一，于黃庭堅更是難有好語。

揚唐抑宋之風，直至清初仍有很大影響，明末清初王夫之論詩尚，也不滿蘇黃的使事用典：“立門庭者必餽釘，非餽釘不可以立門庭。蓋心靈人所自有而不相貸，無從開方便法門，任陋人支借也。人譏‘西昆體’為獺祭魚，蘇子

瞻、黃魯直亦獺耳！彼所祭者肥油江豚；此所祭者吹沙跳浪之鱧鯊也。除卻書本子，則更無詩。”(《薑齋詩話》卷下)指出濫用典故，不僅宋之西昆體如是，即蘇、黃也有此病，甚至可說是宋詩共有之病。吳喬亦認為蘇、黃之詩沒有唐風：“宋之最著者蘇、黃，全失唐人一唱三歎之致”(吳喬《答萬季野詩問》)，“蘇、黃以詩為戲，壞事不小。”“山谷專意出奇，已得成家，終是唐人之殘山剩水。”(吳喬《圍爐詩話》卷五)因此，蘇、黃最多只能在宋人中稱雄，而不能和唐人媲美，其所持的論詩標準仍為唐詩，仍以宋不如唐來觀蘇黃之作。朱彝尊也不喜宋詩：“今之言詩者多主于宋，黃魯直吾見其太生……此皆不成乎鵠者也。”(《曝書亭集》卷三九《橡村詩序》)以“生”概括山谷詩僻澀險怪之弊，也顯出其對黃詩的不滿。

隨著綿歷久遠的宋詩運動的興起，蘇、黃二人之詩也逐漸地為清人所推重。在清代出現了大批蘇詩注本和選本，查慎行、翁方綱、馮應榴、王文誥、汪師韓、紀昀等都曾編注、品評蘇詩，顯示蘇詩廣獲世人青睞。宋詩派、同光體詩人以學宋詩相標榜，也多以蘇黃為師。當時也有人認識到黃庭堅詩的超塵脫俗之處，將其與蘇軾並列，如王士禛在《戲效無遺山論詩絕句三十六首(其一)》中言“涪翁掉臂自清新，未許傳衣躡後塵。”(《漁陽詩集》卷十四)《冬日讀唐宋金元諸家詩，偶有所感，各題一絕於卷後，凡七首(其一)》：“一代高名孰主賓，中天坡谷兩嶙峋。瓣香只下涪翁拜，宗派江西第幾人？”王士禛和元好問一樣，將黃庭堅和江西詩派分開，雖然江西末流給後世留下不好的印象，但是不妨礙黃庭堅本人詩作的清新脫俗，也不妨礙他和蘇軾兩人並列。王士禛對蘇、黃二人並不強分高下：“歐、梅、蘇、黃諸家，其才力學識，皆足凌跨百代。”(《漁洋文略》卷二《黃湄詩選序》)“七言歌行至子美、子瞻二公無以加矣，而子美同時又有李供奉、岑嘉州之剽闢經奇，子瞻同時又有黃太史之奇特，正如太華之有少華，太室之有少室。”(《帶經堂詩話》卷一)以太華、少華，太室、少室為喻，將蘇、黃並提，也並無軒輊之意，表明二人當時是分鑣並騁，非有高下先後。周之麟也謂：“世之稱蘇、黃舊矣，不徒詞翰之謂，惟詩亦然。然蘇之詩麗而該，黃之詩適而則，其規模似不相埒。……蓋蘇公在翰林，較黃公為先，而詩之雄悍魁傑又足以相服，實

則各有所擅也。”(宋四名家詩鈔·山谷先生詩鈔序)精煉地概括了蘇、黃詩的不同特點，同時也指出二人之詩實各有所擅，各有特點，二人也是衷心佩服，相互頡頏。王侁也重拾《後山詩話》遺緒，將王安石、蘇軾、黃庭堅三家並提：“用事琢句，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，大家中備有此法，惟荊公、東坡、山谷三公知之，觀其詩自見。”(《匡山叢話》卷五)從使用典故、推敲詞句的精妙這方面，推重王、蘇、黃三家之詩，這也標誌著宋詩在清代詩壇重新崛起。李調元自謂不喜江西派詩，但也認為“然黃山谷七言古歌行，如歌馬歌阮，雄深渾厚，自不可沒，與大蘇並稱”(《雨村詩話》卷下)，與一般人推崇黃庭堅的律詩不同，李調元與元人劉壘眼光一致，看中的是黃庭堅的七言古詩，欣賞的是山谷詩雄渾奔放、灑脫不拘的詩風，也即與大蘇相仿的一面，認為在雄深渾厚這點上，山谷可與大蘇相提並論。

清人也有繼承前人揚蘇抑黃的觀點，認為黃不如蘇的，張晉本就全盤繼承了王若虛的衣鉢，對黃持批評的態度：“王從之《淳南詩話》專摘挾山谷短處，令古人復起，當亦無辭，蓋公論而非偏見也。竊謂黃與蘇同時，才力本不及蘇，顧不肯自下，欲用間出奇以求勝”(《達觀堂詩話》卷四)。謂王若虛批評黃詩之語是出於公論而非偏見，仍沿襲前人觀點，認為山谷是爲了與東坡爭奇取勝而故意地“用間出奇”，言語間流露出對黃詩的不屑。葉燮也極力推崇蘇詩：“唐詩爲八代以來一大變，韓愈爲唐詩之一大變……如蘇軾之詩，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，天地萬物，嬉笑怒罵，無不鼓舞於筆端，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，此韓愈後之一大變也，而盛極矣。”(《原詩》卷一《內篇上》)認為蘇詩取材廣泛，筆法靈活，意暢辭達，爲韓愈後詩歌一大新變，也爲詩之極致，雖未言及黃詩，但對蘇黃態度還是高下立判。清人對蘇、黃兩家詩風的論說，以趙翼之言爲具代表性：“北宋詩推蘇、黃兩家，蓋才力雄厚，書卷繁富，實旗鼓相當。然其間亦自有優劣。東坡隨物賦形，信筆揮灑，不拘一格，故瀾翻不窮，而不見有矜心作意之處。山谷則專以拗峭避俗，不肯作一尋常語，而無從容游泳之趣。且坡使事處，隨其意之所之，自有書卷供其驅駕，故無拮據痕跡。山谷則書卷比坡更多數倍，幾於無一字無來歷，然專以選材庀料爲主，寧不工而不肯不典，寧不切而不肯不奧，故往

往意爲詞累，而性情反爲所掩。此兩家詩境之不同也。”(《甌北詩話》卷一一)東坡詩以自然見長，消泯人工雕鑿痕跡，山谷詩則因一味要避俗，反而乏自然之趣。東坡也使事用典，然筆力雄健，自可驅遣自如，山谷欲達“無一字無來歷”的境界，多用陳句故實，故筆下常顯得深奧險僻，所要表達之意往往爲詞句所拖累，真實性情反而爲文詞所掩蓋。這裏描述的蘇、黃兩家詩境之異同，堪稱經典。雖謂兩家旗鼓相當，然從對兩家不同風貌的論述中，也可看出他視黃山谷刻意求工求巧、使事用典爲弊端，而以蘇東坡的隨物賦形、任運自然爲優長。

清代盛極一時的桐城派本以古文見長，但與江西詩派也有淵源。桐城文士也推崇黃庭堅：“涪翁以驚創爲奇，其神兀傲，其氣崛奇，玄思瑰句，排斥冥筌，自得意表，玩誦之久，有一切廚饌腥蠅而不可食之意。”(姚範《援鶉堂筆記》卷四〇)奇字麗句僅是山谷詩的表像，崛強兀傲之氣才實其內裏實質，從山谷自成一家之詩，可看到其傲然不屈，獨立萬物之表的人格與氣魄。“山谷刻意少陵，雖不能到，然其兀傲磊落之氣，足與古今作俗詩者澡濯胸胃，導啓性靈。”(姚鼐《五七言今體詩鈔序目》)山谷與古今一般詩人所作俗詩不同，是其有“兀傲磊落之氣”，這氣也表現在詩中，雖尚不能達少陵之境，也自可澡雪精神，導啓性靈。在《荷塘詩集序》(《惜抱軒文集》卷四)中，姚鼐更將蘇、黃與陶淵明、李白、杜甫等並列，視爲詩興高廣深遠的善爲詩者。這些也都顯示出他對山谷的推尊。

同爲桐城派的方東樹則更爲推崇蘇軾，如其言蘇是祖，黃是宗，黃差蘇一級：“杜公如佛，韓、蘇是祖，歐、黃諸家五宗也。此一燈相傳”(《昭昧詹言》卷一)另其將李、杜、韓、蘇四家並稱，而將黃庭堅排除在四家之外：“李、杜、韓、蘇所讀之書，博瞻精熟，故其使事取字，密切贍給，如數家珍。今人未嘗讀一書，而徒恃販賣餽釘，故多不切不確；切矣確矣，往往又磊落不合。雖山谷不免此病。”“杜、韓、李、蘇四家，能開人思界，開人法，助人才氣興會，長人筆力，由其胸襟高，道理富也。歐、王兩家，亦尚能開人法律章法。山谷則止可學其句法奇創”(均見《昭昧詹言》卷一)。黃不能入李、杜、韓、蘇之列，和蘇相比，黃要差一個層次。在《先集後述》中方東

樹也有類似意見：“古之詩人，如太白、子美、退之、子瞻四公，含茹古今，侔造化，塞天地，如龍象蹴踏，如蛟螭蟠拏，當之者莫不戰掉眩慄，色變心死。降而若半山、山谷，沈思高格，呈露面目，奧衍縱橫，雖不及四公之輝赫，而正聲勁氣，邈焉曠世，雲鶴戾天，匪鷄所羣，不其然乎？”（《儀衛軒文集》卷一二）仍將黃庭堅之詩排除在一等李、杜、韓、蘇之後，雖未明言蘇、黃優劣，然從其所論，可見其確是認為蘇勝於黃。同時，方東樹看到了黃的不同尋常之處：“涪翁以驚、剽為奇，意、格、境、句、選字、隸事、音節著意與人遠，此即恪守韓公‘去陳言’、‘詞必己出’之教也。故不惟凡、近、淺、俗、氣骨輕浮不涉毫端句下，凡前人勝境，世所程式效慕者，尤不許一毫近似之，所以避陳言，羞雷同也。而于音節，尤別剽一種兀傲奇崛之響，其神氣即隨此以見。杜、韓後，真用功深造，而自成一家，遂開古今一大法門，亦百世之師也。”（《昭昧詹言》卷一〇）方東樹繼承桐城前輩姚範的觀點，認識到黃庭堅有功於詩，在杜、韓之後“用功深造”，“自成一家”，“開古今一大法門”，從其詩之音節即可見其人之神氣。儘管如此，方東樹仍認為黃詩終未達杜、韓之境。“山谷之不如韓、杜者，無巨刃摩天，乾坤擺蕩，雄直渾斥，渾茫飛動，沛然浩然之氣。”（《昭昧詹言》卷一〇）山谷之不如杜、韓，是因乏渾灑流轉、充塞乾坤之氣。方東樹慧眼獨具，也揭示了黃與蘇在詩歌上的一個重要區別：“坡詩每於終篇之外，恒有遠境，非人所測。於篇中又有不測之遠境，其一段忽自天外插來，為尋常胸中所無有。不似山谷於句上求遠也。”“大抵山谷所能，在句法上遠”，“山谷死力造句，專在句上弄遠，成篇之後，意境皆不甚遠。”（《昭昧詹言》卷一〇）東坡是在整首詩篇中求遠，山谷則僅在句法上求遠，因此東坡詩較山谷詩意境更為深遠。山谷與東坡對詩歌之“遠”有不同的追求方法，由此也造成了不同的藝術效果，這也是山谷不及東坡的地方。方東樹正是從詩歌之“遠”上，分出蘇黃高下。

桐城派後勁曾國藩也喜黃詩，據記載，“黃山谷詩，歷宋、元、明褒譏不一，至國朝王新城、姚惜抱，又極力推重，然二公實未嘗學黃，人亦未肯即信。今曾相國酷嗜黃詩，詩亦類黃，風尚一變，大江南北，黃詩價重，部值千金”（施山《望雲詩話》卷二）黃詩浮沉，與詩壇風尚密不可分，從清末一部

黃庭堅詩集價值十金，可見隨著文壇風尚的轉變，黃詩也重新為世所重。曾國藩自己也云：“大雅淪正音，箏琶實繁響。杜韓去千年，搖落吾安放。涪叟差可人，風騷通盼響。造意迫無垠，琢辭辨倔彊。伸文揉作縮，直氣摧為枉。自僕宗涪公，時流頗忻嚮。”(《曾文正公詩集》卷三《題彭旭詩集後即送其南歸》)這實是和道光、咸豐以來詩壇以何紹基、祁雋藻、莫友之、曾國藩等為首的學宋詩(主要是江西派詩)的風氣(見陳衍《石遺室詩話》卷一)密不可分。姚瑩亦將宋代的歐、蘇、黃、陸並列：“《三百篇》而下，無悖於興觀群怨之旨，而足以千古者，漢之蘇、李，魏之子建，晉之淵明，唐之李、杜、韓、白，宋之歐、蘇、黃、陸，止矣。”(《中復堂全集·東溟外集》卷二《復吳子方書》)李慈銘亦將蘇、黃、陸合稱，“宋人自蘇、黃、陸三家外，絕無能自立者。”(《越縕堂詩話》卷上)同時認為魏泰的《臨漢隱居詩話》和王若虛的《滄南詩話》中“極推東坡而力詆山谷，亦頗過當。”(《越縕堂詩話》卷上)可以說到了清末，詩壇人士又重新看到了黃庭堅詩的特色和價值，將其和蘇軾並列，以作為一代宋詩的代表。同在桐城派內部，對蘇、黃的意見也不一致，於此正可見蘇、黃優劣相爭之烈。

## V. 結語

從以上對蘇、黃優劣之爭的歷史追溯可以看出：

一，蘇、黃之爭，主要是二人的詩歌之爭。蘇、黃的其他藝術樣式，如文、詞、書、畫等，也廣受後世好評，然並非爭論的主要方面，有時就是涉及到，也僅是作為詩歌的陪襯。

二，蘇、黃之爭與時代背景、詩學思潮緊密相聯。北宋時，因為政治鬥爭的影響，蘇黃詩文一度皆遭禁止，南宋以後，隨著元祐黨人政治上獲得徹底平反，元祐學術完全解禁，蘇黃詩文作為元祐學術的代表，受到普遍尊崇。儘管有時特地立異，金元時人對蘇黃的評價總體來說受宋人影響甚深。明代盛行唐風，以蘇黃為代表的宋詩同遭詆斥，清代宋詩復振，蘇、黃詩旋

又爲世所推重。

三，蘇、黃之爭，說到底是唐、宋詩之爭。蘇、黃二人生屬同一時代，但也代表了不同的詩歌類型，蘇近唐，黃則屬宋。蘇、黃之爭，成了對不同詩歌類型的選擇。世人在品評蘇黃之作時，也常是以唐詩或宋詩作爲標準。

四，蘇、黃之爭，並非單純的優劣高下之爭，而是各自的風格特色之辯。蘇詩顯自然，黃詩重人力，爲不同時代的評論者從不同方面不斷標舉、反復論說。宋之蘇、黃，類似唐之李、杜，杜、黃可學，李、蘇難學，蘇、黃身後的門庭聲勢不同，由此也影響到了對二人詩歌的評價，在後世的比較論爭中，蘇、黃各自的詩風特徵也愈益明顯。

### <參考文獻>

- 孔凡禮 校點. 蘇軾詩集[M]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82.
- 孔凡禮 校點. 蘇軾文集[M]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86.
- 黃寶華 校點. 山谷詩集注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3.
- 劉尚榮 校點. 黃庭堅詩集注[M]. 北京: 中華書局, 2003.
- 劉琳 等 校點. 黃庭堅全集 [M]. 成都: 四川大學出版社, 2001.
- 孔凡禮. 蘇軾年譜[M]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98.
- 鄭永曉. 黃庭堅年譜新編[M]. 北京: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, 1997.
- 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. 蘇軾研究資料彙編 [M]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94.
- 傅璿琮.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·黃庭堅和江西詩派卷[M]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78.
- 阮閱. 詩話總龜[M]. 北京: 人民文學出版社, 1987.
- 胡仔. 苕溪漁隱叢話[M]. 北京: 人民文學出版社, 1993.
- 魏慶之. 詩人玉屑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78.
- 何文煥. 歷代詩話[M]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81.

- 丁福保. 歷代詩話續編[M]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83.
- 錢鍾書. 談藝錄[M]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84.
- 郭紹虞. 宋詩話輯佚[M]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80.
- 郭紹虞. 中國歷代文論選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79.
- 王運熙 楊明. 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4.
- 顧易生 等. 宋金元文學批評史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6.
- 袁震宇 劉明今. 明代文學批評史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1.
- 鄔國平 王鎮遠. 清代文學批評史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5.
- 黃霖. 近代文學批評史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3.
- 陶秋英. 宋金元文論選[M]. 北京: 人民文學出版社, 1984.
- 蔡景康. 明代文論選[M]. 北京: 人民文學出版社, 1993.
- 王鎮遠 鄔國平. 清代文論選[M]. 北京: 人民文學出版社, 1999.
- 丁福保. 清詩話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78.
- 郭紹虞. 清詩話續編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3.
- 孫望 等. 宋代文學史[M]. 北京: 人民文學出版社, 1996.
- 張毅. 宋代文學思想史[M]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95.
- 周裕鍇. 宋代詩學通論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7.

#### <全文提要>

蘇軾與黃庭堅為宋代文壇的雙璧，從北宋後期蘇黃並稱起，就伴隨著二人的優劣高下之爭，綿延直至清末，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史、詩學批評史上的一大公案。通過對歷史上紛繁複雜的二人優劣之論的考察，可見蘇黃之爭，與各個時代的時代背景、詩學思潮緊密相聯，其背後實是唐宋詩之爭，在後世的往復論辯中，也愈顯出二人詩歌的不同風格特徵。

关键字：蘇軾，黃庭堅，蘇黃，優劣，唐宋詩

